

孟子（约公元前390—前305年），名轲，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战国早期孔子（约公元前551—前479年）从文化的视角解析析古史时代的更替，塑造大禹精神，开启“水”的哲学阐释。一百多年后，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更加拓展和丰富了“水”的文化、哲学思想，把儒家学说推向了新的高度，也为我们留下许多值得探讨的课题。

《孟子》是儒家典籍“四书”之一，记载了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学说。《孟子》有七篇十四卷传世，有关“水”的论述集中在《梁惠王》《滕文公》《离娄》《告子》《尽心》等篇中。以下略举孟子“水”学说一二，以解析儒家水的思想、文化和哲学理念。

治水中的人文精神

《滕文公》主要记录孟子与滕文公之间的谈话，滕文公向孟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在《滕文公》中，孟子回顾了华夏尧舜禹三帝时期的大洪水及其治水活动，史实主要来自《尚书·尧典》。孟子通过向滕文公叙述尧帝治水，阐述他的治国理念：治国必先治水，唯有治水，才能使百业兴盛，天下太平。孟子用“尧独忧之”，说明尧帝作为圣明君主对治水的关切，希望滕文公也像尧帝一样，以治水为己任，将治水作为安邦之要。孟子的这一思想在《滕文公》开篇就显示出来：“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的话题不离尧舜。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讲孟子时，用“天下方务於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来描述，孟子通过对唐尧、虞舜的尊崇来宣扬阐释儒家的政治思想。

在与滕文公的对话中，孟子虽然是叙述尧舜禹治水的历史，但是他对治水意义的阐释才是最为精彩的。《滕文公》“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禹疏九河，濬济

孟子论水

□ 牛志奇

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这段话描述了华夏尧、舜、禹三帝拨澜壮阔的治水活动和治水后的“中国”，从“泛滥于天下”到“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这是对两千多年前华夏文明演进的完整阐释，是中华民族创世史诗的最早书写，其影响超越了时代。

治水中的民本思想

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他民本思想的核心。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这个命题，回答了如何对待人民对于国家兴亡的重要性。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从而达到“施仁政，行王道”的政治主张，力图将儒家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治理主张，并推行于天下。孟子民本思想中也表达出了水与国富民安的关系。

《孟子·尽心》记载：“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聩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说，让百姓种好他们的地，减轻他们的赋税，就可以使百姓富足。按一定时节食用，按礼的规定使用，财物就用不完了。百姓没有水和火就无法生活，晚上敲人门户求水讨火，没有人不给的，因为家家水火都多极了。圣人治理天下，就要使百姓的粮食多得像水火。粮食多得像水火，那么老百姓哪还有不仁爱的呢？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民

非水火不生活”，朴素而形象地论述了水的重要性，孟子这里取“水”丰沛之意，认为“圣人治天下”，应使民之“菽粟”要像水一样充沛，这样百姓才能过上富足的日子，民富则国强，这里把自然的水赋予了社会属性，把水的管理融入仁政思想之中，在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的战国时代，孟子有如此深刻的思想，非常难得。在《尽心》中，孟子的著名论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其民本思想最为典型、最为突出的体现。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这里提到祭扫按时举行，但仍然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神谷神。社，土神；稷，谷神。古时君主祭祀社稷，就是祭祀土神谷神，后代把社稷代表国家。孟子将兴水利、除水害与治国安邦的辩证关系作了最清晰的阐述。洪水 and 干旱一直困扰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孟子从祭祀指陈民众与君主的关系、水旱灾害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这一论述为后世政府层面主导减灾行为提供了文化意义上的支撑。

治水中的治国理念

《孟子》中对水有十分精辟的论述，反映孟子对水的深刻认识，孟子通过对水的观察、思考，进而“借水”而阐发事理，上升到哲学层面，从而使水成为其哲学思想和治国理念的重要符号。

《梁惠王》“诚如是也，民归之，

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是讲梁惠王见了孟子之后问道：“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呢？”孟子回答说：“天下安定在于统一天下。”“谁能统一天下呢？”孟子说：“不喜欢杀人的国君能一统天下。”“谁会归附他呢？”孟子又回答：“天下没有不归附他的。大王您知道禾苗生长的情况吗？当七、八月间一发生干旱，禾苗就要枯槁了。一旦天上乌云密布，下起大雨，那么禾苗就长得茂盛了。像这样的话，谁能阻止它呢？而现在天下国君，没有一个不喜欢杀人的，如果有有一个不喜欢杀人的国君，那么普天下的老百姓都会伸长脖子盼望他了。如果像这样，老百姓就归附他，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那么盛大的水势谁能阻挡啊！”这里，孟子是借助水的动能形态，警示梁惠王要施仁政于民，人民才能拥护，才能使老百姓像“由水之就下”一样望君主的仁德而归附。《离娄》也有相同的表述——“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圉也”，是说老百姓归附仁政，就像水往下流，野兽往旷野跑一样。这里孟子取“水”之形，但以“水”之性，表明其德治思想和仁政的政治主张。

孟子还通过对水的特性分析，以“水”譬喻，劝导君主应该具有的优良品性。《离娄》：“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盈溢；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徐子说：“孔子多次称赞水，说道‘水啊，水啊！’孔子赞同水的什么方面呢？”孟子说：“有源头的泉水滚滚奔

流，日夜不停，注满洼坑后才向前进，一直流入大海。有本源的事物都是这样，孔子赞同水的这一点。如果没有本源，像七、八月间的雨水汇集，水沟、水渠都满了，但它的干涸也立等可待了，所以，名誉超过了实情，是君子引为耻辱的。”孟子通过对水“不盈科不行”的自然品性的描述，从文化范畴来隐喻君王为政要坚守本源、不忘初心、循序渐进、脚踏实地，这样，治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治水中的和谐观念

《孟子·告子》：“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这一段描述孟子与白圭关于治水的对话，反映出孟子治水要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思想。白圭（前370—前300年），战国时期洛阳人，名丹，字圭。梁惠王时在魏国为相，善于修筑堤坝，兴修水利。白圭对孟子说：“我治理水患比大禹强。”孟子说：“你错了。大禹治理水患，是顺着水的本性而疏导，所以使水流注于四海。如今你治理水患却使水流到邻国家那里去。水逆流行进叫做洚水，洚水就是洪水，这是仁人所厌恶的。你错了。”孟子鞭答白圭筑堤以邻为壑的不义，指出筑堤利与弊的辩证关系。

在《离娄》篇也有类似的表达。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



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孟子称天下讲物性和人性的，只要研究已有的迹象就可以了，已有的迹象，以顺应自然为根本。聪明之所以令人厌恶，是因为它的穿凿，如果聪明人像大禹治水那样，聪明就不令人厌恶了。大禹治水，只是顺应水势，因势利导，看来就像无所作为。如果聪明人也能这样无所作为，那就是太聪明了。孟子以大禹治水以“疏导”成功的例子，表达治水要尊重客观规律，顺应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办事，也是其伦理学说在水利方面的体现，这一点也是集大成者，十分难得。

《告子》：“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於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指出乱砍滥伐和过度放牧，使茂密的山林变成光山秃岭，发出了“苟失其养，无物不消”生态损害的警告，提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的自然生态观。

作为战国时代了解水利本质并进行哲学阐释的先贤，孟子对水的论述，尤其是水的社会与自然观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场父子兵——范仲淹与范纯祐

□ 崔 庆



公元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开始持续袭扰宋朝边境，西北局势不断吃紧。1040年，宋军大败于三川口，朝野震惊，范仲淹从越州任中北上，被举荐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张积极防御，以待战机。1041年，宋军在水川战役中再次失利，范仲淹转任管勾环庆路部署司事兼知庆州，上攻守二策状，试图破解西北危局。战场风云变幻，家国重任如山，良策尤需良将，范仲淹幸有长子范纯祐如影随形。

以静制动

范仲淹对于西北边形势有深刻认识，“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北，倚远而险，未易可取”。西夏民风彪悍，具备所有游牧民族的传统优势，“风集云散，未尝聚养”，作战机动灵活。比较敌我优劣，范仲淹认为，“国家用攻，则易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刚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在这种思维主导下，屯田戍边是稳中求进之策，须在关键位置加强军事守备。

西夏骑兵虽强，但非大开大合，而是反复袭扰。在边境地带，西夏筑有金汤、白豹、后桥三处寨堡，楔入宋朝领土，不仅阻断了延州、庆州之间的联系，使宋军前后不能相顾，同时为骑兵提供了稳定

的后勤补给，便于实施袭扰之策。范仲淹建议，一方面要重点攻击这些西夏寨堡；另一方面要修筑己方的城寨，“大为城寨，以据其地”“方诸旧寨，必倍其数”。不仅要扩大已有寨堡的规模，还要增加数量，形成环环相扣的防御体系，以静制动，步步为营压缩西夏骑兵的活动空间，此为固本制敌之策。

虎口涉险

良策在胸，何处破局？范仲淹首先想到要重建于20年前的大顺城。此处与金汤、白豹、后桥针锋相对，能够与西北方向的柔远寨、东北方向的荔原堡形成呼应，切断西夏骑兵的袭扰路线。但在西夏强大骑兵的鼻息之下，大兴土木修筑堡垒谈何容易，须有胆识，更要有担当，谁来承担这项艰巨危险的任务？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范仲淹对长子纯祐委以重任，要策划一次瞒天过海的军事行动。范仲淹生有四子，长子纯祐始终侍奉左右，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范仲淹曾在苏州工作，经兴办教育，学生众多，但不服管教。当时纯祐年仅10岁，在学生中年龄最小，却严守学校规矩，成为其他学生的榜样，学风渐渐好转。知子莫若父，知父莫若子，纯祐要和父亲同心协力，共同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1042年3月，宋军分批次从庆州出发，行动极为保密，诸将事先不知此行目的地，只知道向东挺进。范纯祐和番将赵明带领精锐前锋先行，范仲淹自领主力紧随其后。当前锋行至大顺城，后军抵达柔远寨，范仲淹突然下令，前军就地驻扎，开足马力修筑大顺城；后

不动如山

宋军修筑大顺城，无疑是爆炸性消息，西夏发现之后，立即派遣三万骑兵来攻，准备在坚城未起之际，一举除去心腹之患。然而范仲淹对此早有防备，集结本部主力，在大顺城外围摆下堂堂之阵，严阵以待。西夏军无机可乘，在交兵之际假装溃败而走，试图引诱宋军主力远离大顺城。面对大好“胜局”，范仲淹保持了清醒头脑，节制诸部，急令不可追击，以防敌军设伏。事后证明，范仲淹的担心不虛，西夏军果然没有埋伏，但没有得逞，只能悻悻退去，“以重兵戍金汤、白豹两城”，龟缩回己方据点。

大顺城完工之后，很快发挥出更大作用，一是自通经脉，宋朝西北的延、庆两州连成一体，诸部兵马可以相互支援；二是震慑西夏，其有生力量被牵制在白豹、金汤诸城；三是断敌袭扰，大顺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西夏不能再无所顾忌南下侵犯宋境。此后，在范仲淹的推动下，宋军在西北屯田戍边、修筑寨堡，极大地限制了西夏骑兵，攻守之势易易。1043年正月，西夏主动提出议和要求，宋、夏于次年4月达成和平协议，西北局势恢复平静。

修筑大顺城虽然风险极大，但却是扭转西北局势的关键。范仲淹、范纯祐父子上阵，父不以子忧，子不以事惧，父子坚兵浑然一体，共成军国大事。据说范仲淹登临大顺城，感慨万千，写下名篇《渔家傲·秋思》，“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雄浑苍凉雄掩壮士豪情，父子同心、将士用命，共守国泰民安。

范氏家风，后世称颂。范纯祐天资聪慧，“方十岁，能读诸书”“为文章，籍籍有称”，誉之神童，已不为过。然而，纯祐不慕功名，“不应科第”，陪伴父亲左右，以安诸弟之心。范仲淹曾评价诸子，纯仁得其志，纯礼得其静，纯粹得其略，纯祐未有评语，实得其孝。百善孝为先，有子如此，父可大慰平生。父子同行，世间至乐。



成长于民间的宣帝富有很强的社会经验，非常了解地方官吏欺上瞒下的伎俩和盘剥百姓的手段，“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宣帝根据生活经验认为地方官员为政要有一定时间才会有效果，频繁更易只会让百姓无所适从，“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因此宣帝一朝地方官员的留任时间比较长。宣帝还从国家整体状态发现地方官员呈报上来的统计表多是弄虚作假的空文，“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他让御史去核查地方计簿的真实与否，并处罚那些计簿虚假的地方官员，以此督促地方官员实事求是，“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

为保证政令的上传下达，汉宣帝省去尚书审核这一步骤，让官员的奏疏可直接达自己的跟前，“去副封以防屏蔽”。汉朝的旧制是官员上书时抄录正副两封，尚书先看其中的“副封”，如果尚书认为上书内容不合适，可以直接屏蔽，不用上奏给皇帝。这种制度给了尚书动手脚的机会，阻隔了皇帝和官员之间的直接联系，让作为政策制定者的皇帝难以知道政策施行的实际情况。汉宣帝为了了解天下百姓的所求所急，便令地方官员可以直接上书至自己的案头，以防中间的阻隔和雍蔽。

汉宣帝还用巡视制度来保障舆情的上达和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宣帝经常派遣中央官员前往地方巡视，考察地方官员是否尽职尽责和民间百姓是否生活良好。如地节四年（前66年）汉宣帝下诏书说：“朕惟百姓失职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国问民所疾苦。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之。”宣帝心寄百姓，考虑到他们或许会受到地方官吏的骚扰和欺压，因此派遣使者去巡视地方，聆听百姓的呼声。元康四年（前62年），宣帝派遣大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五凤四年（前54年）又派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以前使使者问民所疾苦，复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巡视的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考察吏治得失，看看官员是否称职，有没有做到为百姓作主；二是观览地方风俗，了解民意，体察民情，掌握地方官员的治理能力；三是观察

民间是否有冤案，官员为政是否苛察；四是赈济灾荒，百姓遭遇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后常常颗粒无收，汉宣帝就此常派遣官员去救济，“今岁不登，已遣使者赈贷困乏”；五是选拔优秀人才，“举茂异伦之士”。

巡视制度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督制度，是汉宣帝关心百姓生活和考察官吏能否胜任的一项重要手段，对地方官员起到了很好的监督纠察作用，它震慑了滥用权力的贪官酷吏，表彰了勤恳务实的实干官员，澄清了国家的吏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